



转型文库

丛书主编 冯绍雷

后民族主义的 认同建构及其启示

争论中的哈贝马斯国际政治理念

马珂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转型文库

丛书主编 冯绍雷

后民族主义的 认同建构及其启示

争论中的哈贝马斯国际政治理念

马珂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民族主义的认同建构及其启示:争论中的哈贝马斯
国际政治理念/马珂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转型文库)

ISBN 978 - 7 - 208 - 08956 - 3

I. 后… II. 马… III. 哈贝马斯, J. - 政治思想 - 研究
IV. D095.166 B51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8417 号

责任编辑 于力平

封面装帧 人马艺术设计工作室·储平

后民族主义的认同建构及其启示

——争论中的哈贝马斯国际政治理念

马珂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7.5 插页 4 字数 227,000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8956 - 3/D · 1638

定价 30.00 元

丛书总序

最近四十多年来发生在欧亚等地区许多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问题,大概是近半个世纪世界历史发展中与各国的国计民生最相关联,因而也是令人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同时,转型问题不可避免地是充满着争议的学术领域之一。所以,对于转型问题的研究就很自然地成为当今国际国内学界各个领域所重视的对象。

—

对于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问题在各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叫法,最为普遍的叫法就是“改革”。但是“改革”一词原来是相对于“革命”而言的。一般说来,前者意味着是在基本宪政制度不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所发生的体制变化,而后者指的是改朝换代式的基本国家制度的更替。但是,最近三四十年中所发生的体制变革似乎打乱了这种词义上的区别。体制变迁既可以发生在宪政制度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之下,例如中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所推进的改革;同时,也可以发生在社会基本制度发生天翻地覆的重大变化的历史过程当中,就像伴随着苏联解体所出现的这一场先叫“重构”、后来又叫“改革”的制度变迁。发生在俄罗斯的引起了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如此重大变化的转型,尽管其形式是那么激进,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却认为这场变革的内容中还是透漏出了很多的传统基因。而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渐进性、局

部推进式的改革,从形式上看是比较稳健的,但是,按照邓小平的理解:改革就是革命。

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所包含着的这些不同类型的社会变革本身已经说明其内容之复杂、其形式之多样、其背景之深远,而这样的复杂多样的体制变革却集中发生在最近这三四十年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并且是发生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之下的各个地区和各个国家,足见其非同一般。根据不少国际学者的理解,这场史无前例的制度转型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从欧洲南部首先开始的。当时在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先后发生的民主政权取代独裁政权的变革引发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转型进程。在此之后,大体上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由于人文、地缘、经济,以及传统纽带的联系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在拉丁美洲和东亚差不多同时大规模地开始了从军人专权或者威权体制向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而发生在前苏联东欧地区的转型进程,实际上更早就开始了。最早甚至于可以追溯到二战刚刚结束时在南斯拉夫地区出现的变革过程。南斯拉夫在政治、经济、社会,甚至于在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苏联关系上)寻求各种类型的“自治”的努力相当直接地影响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在匈牙利和波兰的改革。而 50 年代中期先是改革,而后发生的震惊世界的波兰和匈牙利的事变又深深地影响了 60 年代中期以后发生在大多数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这一阶段的改革断断续续地延伸到 80 年代后期。紧接着的就是令整个世界措手不及的先是东欧、后是苏联的以政治剧变为标志的冷战的终结。

出现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并且是有着不同类型和具有不同影响的体制转型过程,大体上有着相似的社会历史内容,那就是从传统的权力较为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其形式可以是军人政权、政治威权体制,也可以是传统计划体制)向现代的民主、法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这样一种巨大的历史性转换超越了意识形态、社会体制、种族肤色、地理方位,包括发展水平和国家实力等各种差别,显示出五彩斑斓、声势浩大的局面。

按照科尔奈的说法,发生在20世纪最后这几十年的体制转型进程,是自世界历史告别中世纪,进入近代以来最为深刻的一次社会历史的变革。这场体制转型所具有的巨大规模和深刻意义唯有工业革命和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这样的大变革才可以比拟。如果从所涉及的国家来说,从南欧到拉美、从东亚到东欧、从非洲和南亚,各地大多数非欧美国家都被卷进了这样一个民主化、市场化的宏大进程中,其规模与气势确实令人叹为观止。如果从变革的深度和影响力来说,一方面是激发了这么一大片国家和地区的活力,提升了它们的实力、效率和发展水准,深刻地改变了这些地区和国家的面貌,使之在当今世界权力转移过程中越来越明显地形成了一个与传统的欧美列强抗衡的格局;另一方面,由这场大变革所引起的冲击和动荡也足以令人瞠目,其中最为让人料想不到的就是苏联的解体,包括东欧的剧变。

这样的一场大变化,除了少数地区和国家,基本上是在兵不血刃的和平情况下发生的,因此也就更多地留下了关于体制与社会转型问题的各种不同看法与意见,迄今难以统一。这一时期各国各地区内部体制转型进程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始终伴随着一个遍及世界各地的外部的宏大过程:全球化。现在的研究还没有能够搞清楚,到底是20世纪末叶的全球化过程引发了各国内部的体制转型,还是相反,由各国体制变迁推动了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也许这是一个永远无法求解的“蛋生鸡”与“鸡生蛋”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两种现象互相作用而发生的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二

对于这样一种以政治经济体制转型为核心的社会变迁的研究,即使有着丰厚学术基础的西方,也是处于起步的阶段。其原因就在于体制转型本身还只是一个刚刚开始不久的历史过程。

在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学科分类去描摹这样的一个全新客体的情况下,在西方,有人将体制转型问题的研究干脆称之为“转型学”。但是对于转型研究的学理背景、学科基础,乃至于范畴体系和学科方法则迄今还是众说纷纭。也有人认为,对于体制转型问题的研究应该以传统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为主导来展开研究,但是,传统经济学主要从事静态的经济现象的研究,而体制转型过程则是一个动态过程。传统政治学受到经济学较大的影响,多半程度上更集中在稳定态制度的研究,较少有像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样的作品。近来还有不少学者认为,体制转型的研究应该是一门跨学科或多学科研究的门类。从现象上说,体制转型涉及政治博弈、经济运行、历史背景、文化传承,以及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当然是一个多学科或者跨学科的知识领域,但是如何把这些五花八门的知识用来解释和分析纷繁复杂的转型现象,还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并不是来自各种不同学科门类的专家学者们坐在一起,就能够形成多学科研究的,而是必须在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和方法上有更多的创设才能够成其事。

与转型学研究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按照科尔奈的说法,转型研究不太关注一些具体细节问题的考察,而是主要集中在一些宏大问题的讨论,以及各个转型领域的相互关联性问题的研究之上。这一观点又为我们从事转型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也即,转型研究是远远超越了一般学科意义上的知识门类,而是一个反映当下过程动态特性,也因之而具有很强的战略指导性的一个知识门类,但是,这样一种全新知识结构的形成需要相当完备的信息系统的支撑,特别是对于各学科知识积累的汲取和荟萃,这是需要长期艰苦努力才能获得成功的事情。

总之,相对于根基深厚的传统学科,犹如历史学、哲学、文学这样枝叶繁茂的学术构建,转型研究的基础还是非常的薄弱。

然而,当下急剧变动中的社会对于理清自身发展的轨迹与脉络,对于这样一场如此激荡人心的社会大变动的深入分析与认知,都迫不得已地将转型研究的问题提上了日程,特别是需要将转型研究置于一个

认真合理地构筑的知识框架之下。于是,就有了总结和整理迄今为止的有关体制转型问题的重要文献、资料,并尽可能地将其系统化,在切实地推进实证研究基础之上将其逐步地理论化的诉求。

虽然理论和实践的积累都还相对薄弱,但是,这种转型研究已经在各个学科方向上迅速地铺陈开来。

三

对于转型问题研究较为直接的兴趣和需求更多地是来自关乎转型进程本身的问题。这里包括有关转型的发生及其背景、转型的进程与周期、转型的速率、转型的功能与效用、转型的比较研究、转型成效的评价标准等问题。

转型这一现象之如何发生,以及转型发生时的状况始终是一个使无数学者着迷的问题。按照亨廷顿在《第三波》中的解释,20世纪末叶体制转型具有重要的共同背景:其中包括威权体制的合法性危机、世界性的经济增长、天主教会所起的作用、外部行动者的改变立场,以及“滚雪球”效应。而按照林毅夫的判断,转型之所以发生,更多的在于社会思潮所起的作用,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风靡一时的“新自由主义”路线秋风扫落叶般的席卷全球的影响力,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林毅夫所指现象的意义。但是,对于任何思潮而言,如何具体地作用于转型实践,还是要有更多的实证研究,才能理清脉络。包括对于“新自由主义”一类思潮,究竟在转型过程中产生了何种影响,恐怕也不是简单的“扣帽子”甚或大批判所能说清楚的问题。

转型的进程与周期问题也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这里包括的问题是体制转型进程是否有一个一般的模式;是否只能够以政治,或者只能够以经济,或者只能够是政治与经济的全面开花为起点;是否必须要承受改革初期的大规模经济下降的磨难等等。最近几年国际学术界的一个关注焦点,是所谓的“第二次转型”问题,也即人们发

现,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正在出现一个对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转型的不同程度的调整和逆转,以克服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一次转型”所带来的“体制陷阱”。比如,在俄罗斯就出现了普京式的部分地加强中央权力以维持稳定的重大调整,这一现象也在其他地区和国家中出现。于是就产生了改革要以怎样的进程与周期推进才能够取得效用的问题。

体制变迁中的绩效评价问题,到底是以怎样的标准来衡量,是以体制建设的进度来加以考察,是以执政党的选票多少来考量,还是以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实际程度来加以区分。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不同时期,乃至于一届政府对于这样的绩效评价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学者们关注这样的评价,是有着一系列的理论考量的:不能够以牺牲当代来服务于将来,但是也不能够只是以民粹主义的态度取悦于民众,而不顾及未来的长远发展。

包括体制转型的进程是否能够相互比较的问题,这不仅是学术界的一个非常普遍的争论问题,而且,也是决策和实务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比较是相互借鉴的前提。回想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前期,我国学术与决策界对于苏联东欧地区的改革经验与教训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希望能够在当时我国自身实践经验相当匮乏的背景下,从彼处取经。当时这种相互比照借鉴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我国与上述国家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未曾料到的是,当我们还想继续从苏联东欧的经历中寻求知识和取得灵感的时候,它们自身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比较研究的社会主义这一前提瞬间消失了。当然,所谓的转型比较研究还包含有更加广泛的内容。比如,在南欧、拉美、东亚、东欧等地区各不相同的转型问题究竟是否存在比较研究的可能性,国际学界并未就此得出一致意见。

这样一类转型问题的定位与界定、本色与特性、进程与周期、速率与节奏、绩效与评价、比较与借鉴等方面的问题,都是属于转型本身问题的研究。

四

对于转型问题的另一类研究是有关转型的基本理论问题。比如,有关体制转型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有关转型进程中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有关历史传统与当代转型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

转型问题的研究之所以会超出传统学科的领域,多半是由于存在着对于这一类宏大问题的考量;同时,这也是转型研究不仅富于理论性,而且,还富于相当浓厚的战略与决策特性,甚至于还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一个重要背景。

对于体制变迁与外部环境相关性的观察已经非常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国际学界的重点话题领域。用我们习惯的话语来说,这个问题研究的就是改革和开放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经常会习惯地指称,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推动开放。好像改革与开放之间只存在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但是,实际转型的过程中,往往开放过度又会成为阻碍体制变迁与破坏稳定的重大灾难。比如,1997年金融危机所暴露的东南亚国家金融体制过多地受到外资侵扰,以及随后多年的动荡,反映的就是这样的问题。

在当前的国际学界,国内体制变革与国际秩序构建的内在关联性问题已经受到了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的来自各个方面的广泛的关注。新保守派代表人物惊呼,当今国际秩序正在被“欧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和“中国与俄罗斯的权威主义导向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这样的区分重新一分为二,似乎两相对立的冷战又要重新点燃战火;而自由派人士则依旧悠然自得于“当今国际体制如此完备而富于弹性”,因而足以吸纳新兴市场国家和转型国家加入这一体制。在笔者看来,恐怕这两种趋势都未必成为将来的现实,而正在转型中的新兴经济体与国际体制的互动才是构建未来国际秩序的更为可能的选择。无论上述的哪一种观点都表明了,体制变迁问题已经与国际体制的重构问

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转型研究中的一个比较敏感,但也是相当基本的问题,便是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具体而言之,就是政治体制与经济相互关系问题。有人将这一问题表达为政治民主化水平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问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前后,比较普遍的社会思潮是将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加以观察,认为只有同时实施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才能取得成功。近年来,来自波兰,但却在美国长期任教的普热沃斯基经过了对上百个国家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他自己的结论。他认为,在中短期的背景之下,无法对转型时期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问题作出明确的判断。政治民主化了不一定能够确保经济的增长,相反,经济发展了,未必就一定推动政治民主化的发展。

虽然,就像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普热沃斯基依然是对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前景问题寄予厚望,但是,他经过认真研究所得出的相当务实的结论却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关于转型过程中的传统文化与当代变迁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至少目前有这样的几种说法。一派意见强调政治文化的继承性,认为文化传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当代制度变迁,但是另一种意见强调传统文化与当代变迁之间的断裂性,并认为,从传统文化角度来观察当代制度变迁,难以解释为何同样一种文化,在某一时段会倾向于变革,而在另一个时段,同样一种文化会拒绝这样的变革。

几十年转型研究的实践对于这样一类宏大理论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无数重要的实证材料,使得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一整套理念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其中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强调的一步到位式的、政治经济全方位推进的,以及激进的改革路线只是获得了许多出乎意料的结果;事实表明,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式”的、“试错式”的稳健型改革相形之下却获得了大大的成功。虽然,中国的改革还没有能够从理论上提供一个完备的模式,但是,实践为理论的构建创造了前提。

五

再有一类转型研究是关于转型进程中的“范畴研究”。其中既包括像转型中的“要素”或者“现象”问题的研究,比如,转型社会中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体制转型中的作用、官僚和体制转型的关系问题、转型中的利益集团问题;还比如,转型中的腐败问题、体制转型与社会公正的关系等问题。也包括更加广泛意义上与转型问题相关的范畴问题的探讨。

在转型现象千变万化,尤其是其结果与进程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的时候,任何抽象理论的推导都比不过实践的丰厚。因此,笔者建议,在对于转型现象还需要进行非常深入细致的理解和研究的情况下,抓住几个要害问题,从内容较为有限的“范畴”的角度着手,形成对于某一领域的转型问题的深入洞察,这可能是研究转型问题较为容易的突破口。

本丛书是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欧洲研究中心的同仁在多年从事转型研究以后初步成就的一个汇总。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选列了事关转型研究的一系列关键性范畴。比如,我们选择了“帝国”、“后现代国家”、“联邦主义”等范畴作为切入口探讨转型国家的国体与政体问题;我们还选择了“移民”、“选举”、“第二次转型”等范畴讨论典型的转型现象问题。类似的题目我们还将继续作出进一步的选择。

但愿从范畴角度的伸展能够为总体的转型研究提供新的路径和新的方向,这是我们的一项新的尝试。

冯绍雷

目 录

丛书总序.....	1
导论.....	1
第一章 历史上的思想家	14
第一节 欧洲统一的目的	17
第二节 欧洲统一的基础	23
第三节 欧洲的统一与世界主义	26
第四节 小结	31
第二章 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	35
第一节 前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	37
第二节 现代社会集体认同为何会成为一个问题?	41
第三节 现代社会集体认同的规范内涵	45
第三章 后民族主义的集体认同建构	
——突破民族认同与民族国家的框架	53
第一节 宪法爱国主义	54
第二节 哈贝马斯与泰勒之争——以法律建制为中心的 集体认同对多元文化的包容	63
第三节 民族国家在当代全球化、多元文化压力下的困境.....	71
第四章 普世主义价值——欧洲与世界	80

第一节	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合法性	82
第二节	人权的普遍主义与人权的相对主义	87
第三节	作为法律规范的人权与作为道德规范的人权	100
第四节	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106
第五章	后民族主义的欧洲?——在现实与理想之间	114
第一节	土耳其与欧盟的集体认同:规范的、文化的抑或是 现实的考虑?	114
第二节	欧盟东扩与俄罗斯:容纳还是对立?	121
第三节	正在形成的欧洲公共领域?	128
第四节	共同欧洲移民政策——后民族主义的欧洲还是 欧洲民族国家?	134
第五节	危机中的考验——分裂还是团结?	141
第六节	欧洲——通向世界内政的先行者?	147
第六章	哈贝马斯后民族主义认同理论的批评者	164
第一节	民族主权主义者的基本主张	165
第二节	民族认同的人为性	178
第三节	对民族国家“衰落论”的批评	182
第四节	对宪法爱国主义的批评	184
第五节	公民共和主义:超越民族主义与宪法爱国主义? ...	189
第六节	激进的后民族主义——拒绝任何形式的认同 政治	195
第七章	为后民族主义辩护	205
第一节	如何应对来自民族主义者的批评?	206
第二节	倒向民族主义的后民族主义?	218
第三节	小结	223

目 录

第八章 中国语境.....	227
第一节 中国的思想传统.....	228
第二节 不同的思想资源:西方与中国	232
第三节 中国的当代语境.....	237
第四节 中国的大国责任.....	242
参考文献	251
后记.....	259

导 论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哈贝马斯的理论兴趣开始转移到政治哲学、特别是国际政治哲学上来。促使其学术兴趣发生转移的现实因素大概有这样一些:(一)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开始暴露,而经济与社会上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开始抬头。(二)随着苏联的解体与东欧的剧变,冷战中占主导的意识形态斗争让位于世界上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冲撞。^①(三)民族主义运动在东欧及巴尔干地区的重新兴起;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统一在德国知识界内也掀起了一场有关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的争论。(四)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跨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互联网的普及,全球化以不可逆转的趋势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也对民族国家的传统角色与职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五)世纪之交发生的系列局部战争以及恐怖主义战争表明这个世界并没有摆脱战争的威胁,并且在学者中引起了关于人权与国家主权的讨论。(六)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为界,欧洲一体化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快速经济发展后,进入了艰难的政治一体化和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与这些当下的现实问题相比较而言,欧洲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所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一直是哈贝马斯心中最深的隐忧。启蒙运动为人们带来了诸多的普世性价值:比如人本主义、理性至上主义、平等、人权、民主以及自由等。现代性的这些价值随着欧洲的殖民主义扩张在全球的其他地方也散布开来。然而,现代性的这些普世价值最先遭到怀疑与批判,也是在欧洲。尼采是开启这一批判的先驱。随后的存在主义哲学以及解构主义思潮是 20 世纪批判现代性与启蒙运动及其普世价值

的两个主要流派。而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则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对现代性进行了全盘的批判,其态度完全是悲观主义的。

作为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学者,哈贝马斯并没有延续他的前辈们对待现代性的悲观态度。尽管现代性在西方以及全球已经表现出诸多的危机与矛盾,但他坚持可以在内部对现代性的种种弊端进行修正,他将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看作一项“未完成的事业”。

这些近忧远虑是哈贝马斯的哲学理论,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国际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主题。哈贝马斯立足于他一贯的普遍主义立场以及他前期的现代性理论、交往行动理论,对这些近忧远虑进行了深入的、规范意义(normative)上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后民族主义理论。后民族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在于,它坚持现代政治共同体的集体认同从规范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基于民主法律的某种建构,而不是基于前现代的民族认同,不论它是文化的还是血缘的;现代民族国家应该打破民族国家主权至上、民族国家在国内国际政治中是唯一和最终的行动者的传统思维,并在更大的范围内结成政治共同体——最终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民主治理或世界内政,从而共同应对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带来的诸多挑战。在坚持现代性的积极成果的同时,后民族主义理论试图从内部克服世界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和挑战。具体说来,哈贝马斯最近十多年来关注的主题有:人权的跨文化讨论、不同文化类型之间如何能够平等共处、民族主义在当代社会的复兴、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遇到的挑战、世界公民社会与世界内政以及欧洲政治一体化等等。

在这些具体的论题中,哈贝马斯立足于他的后民族主义理论,对欧洲政治一体化的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讨论。就在前几年——在法国和荷兰否决欧洲宪法草案前后——哈贝马斯还公开发表文章或接受采访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予以分析。哈贝马斯之所以如此重视欧洲政治一体化的问题,并将它视为实现其后民族主义理论的希望,笔者认为大概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首先,欧洲政治一体化是一个在政治理